

# 关于华土石窟中弥勒和 阿弥陀图像分布的一些解析

严耀中

〔摘要〕通过对华土石窟中有关净土信仰的图像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的一些解析,说明中国净土信仰中的弥勒崇拜和阿弥陀崇拜是混和的,尤其在唐宋以降的民间。随着中国佛教的本身融合和民间化的过程,二者之间的差别已无实质意义,这反而有利于净土信仰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本文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图像解析在宗教研究上的用处。

〔关键词〕弥勒;阿弥陀;图像分布;石窟

〔中图分类号〕K8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1)06—0024—07

〔作者简介〕严耀中,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200234

中国的净土信仰主要分为二大支流,即以敬奉阿弥陀佛为主的西方净土信仰和以敬奉弥勒佛为主的兜率净土信仰。长期以来,二种净土信仰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相互关系及其成因,是学者们经常探讨而尚无定论的一个题目。愚见以为通过对弥勒佛和阿弥陀佛图像分布的研究,也许不失为对中国净土信仰进行探索的一条途径。

—

图像对中国佛教信仰有着特殊的意义。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就因为其供奉佛像构成特色而被称为“像教”。<sup>①</sup>佛教能在中国普及当然有诸多原因,佛像(包括菩萨像等)作为教义的一种视觉陈述,在其中的作用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故塑像之盛是其教兴旺的一个标志。不仅如此,由于塑像形态之异实际上也是标示着教内信仰和教义之间的一些差别,所以叙述佛教某宗某派之兴衰,也可从其崇拜之图像形态及其在空间与时间的分布上得到一些印证。

净土信仰是中国佛教中社会影响最大的一部分,与诸净土信仰相关的图像,如弥勒、阿弥陀、药师佛等无论是从空间还是时间的角度上视之在古代中国之分布都是极其广泛的,两者正好能够互相证明。不仅如此,因为“在各个时期事实上佛教本身都具备有艺术的表现”,<sup>②</sup>所以广义净土信仰的多义内涵,图像崇拜的不同指向,也代表着它们信仰上的不同倾向“或冀生安乐土,崇拜弥陀;或求生兜率,得见慈氏(弥勒)”。<sup>③</sup>这些既表现在佛像的形态服饰上,也反映着它们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上。

在涉及净土信仰的各个造像中,最复杂的当数弥勒。李淞先生简洁地归纳说是因为“汉译佛经中,有二十余种以弥勒为主要内容。弥勒的身份比较复杂,主要有三种:婆罗门弟子、菩萨、未来佛,

① 《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点校本作“象教”。《志》所叙佛教自汉武帝、汉孝明帝世起,传入过程中处处皆离不开像的伴随。

② 渥德尔《印度佛教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59页。

③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7页。

中国的弥勒信仰主要是后两类,即弥勒菩萨和弥勒佛”。<sup>①</sup> 宫治昭先生认为“佛教图像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均与其产生的信仰背景有关,所以,通过分析佛教图像亦可探明背后宗教世界的情形”,因此他专章论述了中亚与“印度弥勒图像历史的地域的演变情况”,在中国则提及了炳灵寺、乐山等弥勒大佛和克孜尔石窟中的弥勒图像。<sup>②</sup> 李裕群先生认为在北方石窟中“北魏时期交脚弥勒颇为流行,所表现的是处兜率天宫敷演众生的形象,即决疑之弥勒,这与北魏僧侣提倡自身修养有关”,至北朝晚期“作为窟内主尊,交脚弥勒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倚坐或半跏坐佛装之弥勒,所表现的是龙华三会,普渡众生的形象,与交脚弥勒有明显的差别”,<sup>③</sup>等等。不过由于阿弥陀佛不仅因为又可称之阿弥、弥陀、无量寿佛,《阿弥陀经》卷上说其还“号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焰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超日月光佛”等,因此在石窟的各种图像及题记里寻找出并确定它的全部踪迹亦非易事。

由于一般有关石窟图像的论著主要是对图像造型的特征分析来进行类比,所以本文试图在更广的范围里讨论中土的弥勒和阿弥陀图像分布及与净土信仰之关联。

虽然在大多数的佛教寺院中都有着弥勒或阿弥陀的塑像,但由于一般砖木结构的寺庙几乎都是不断地被毁坏又重建或重塑,所以明清时期遗存的塑像或壁画已经很少,更不用说此前的了。因此能够比较确实反映这些图像信仰的历史面貌,只有那些石窟寺中的造像,由于它们不易被破坏或被重点保护而能够留存至今。在诸大石窟中,据王仁波先生统计,仅镌有弥勒像的小石龕,在云冈石窟有121个之多;在龙门石窟有126个之多。<sup>④</sup> 包含着弥勒造像的“三世佛”是云冈石窟的主题内容之一,“云冈早期造像内容便以表现三世佛为主,……云冈中期时,以象征过去佛的儒童本生与象征未来佛的弥勒、现在佛的释迦共为表现三世佛的造像思想已露端倪。及至晚期,随着三世佛组合表现的多样化,第15窟最早出现了由释迦、定光与弥勒组成的三世佛造像实例”。<sup>⑤</sup> 此外中国北方的很多石窟由于规模较小,地处荒僻,风化严重而难见雕像真貌。还如宁夏须弥山石窟,基本上凿于北朝至隋唐时期,但绝大多数雕像因为风化而不能辨认,但残迹如子孙宫区14号窟(北魏)“东面龕内雕一交脚菩萨,头已失,左手抚膝,右手持物贴右胸前,交脚坐于方形高座上”的,<sup>⑥</sup>应该是交脚弥勒像。又如根据日本学者佐藤智永对龙门、云冈等北朝石窟中有纪年的弥勒和阿弥陀塑像数的统计,前者是150尊,后者是33尊,显凸出当时弥勒信仰之旺盛,似乎超过了阿弥陀信仰。<sup>⑦</sup>

不过中土石窟中,尤其在隋唐之前,弥勒造像多于阿弥陀造像的原因之一恐怕是与佛像北传通过中亚输入时的情况有关。从现今新疆地区一些石窟的残存造像来看,库木吐喇石窟和森木塞姆石窟尚有弥勒图像的遗迹可寻,但没有阿弥陀像的踪影。<sup>⑧</sup> 在克孜尔千佛洞,“禅定僧、山岳构图、涅槃图(涅槃像)、弥勒菩萨等图像相互关联的图像构成,即反映在克孜尔独特的图像结构中”。<sup>⑨</sup> 这些石窟是“如此地接近中国并处于中国在那里有着政治霸权的时候,其中国影响不难寻找”。<sup>⑩</sup> 而且“克孜尔石窟与其他的中亚美术,特别是巴米扬以及敦煌北魏、西魏石窟的主题和图像构成都有关

① 李淞《论中国菩萨图像》,载《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88页。

② 宫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第三部第一、二章,中译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

③ 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下篇,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页。

④ 王仁波《试论云冈、龙门石窟北魏主要造像题材与佛教史诸问题》,载《上海博物馆集刊》第7期。

⑤ 赵昆雨《云冈石窟佛教故事雕刻艺术》,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⑥ 《须弥山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

⑦ 佐藤智永《北朝造像铭考》,载《史學雜誌》八十六编第10号(1977)。由于佐藤之统计仅限于有纪年的塑像,且也不包括壁画,所以有一定局限性。

⑧ 龟兹石窟研究所《库木吐喇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264、268页;《森木塞姆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⑨ 宫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第三部第二章,第398页。

⑩ B. N. Puri, *Buddhism in Central Asia*,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Delhi, 1987, p. 254.

联,其意义深厚”。<sup>①</sup>即这些石窟处于中亚到内地的丝绸之路上,具有宗教文化衔接的过渡形态,于是内地的阿弥陀图像则联系不上这样的意义。

其实有关净土信仰的造像,在中国最早出现的有年份题记的是西秦建弘五年(424年,一说为建弘元年)甘肃永靖炳灵寺169号窟中的无量寿佛像。<sup>②</sup>而且阿弥陀佛像也为数不少。据李玉昆先生统计,在龙门有纪年题记的佛或菩萨像中,明确是北朝弥勒像的有32则,而明确题为阿弥陀或无量寿佛像的只有8则;隋唐时弥勒像只有14则,而阿弥陀像则有137则。<sup>③</sup>可见北朝弥勒信仰之盛行,隋唐则风气有变,至少在一些石窟群中阿弥陀像占了绝对多数。仅龙门老龙洞内,就能“找到24龕像标明为阿弥陀佛”,清明寺洞题记标明的“共有12龕阿弥陀造像”;蔡大娘洞中“虽然记明为阿弥陀佛的虽然不多,但多数小龕(一佛二菩萨)具有阿弥陀佛倾向”,而“从惠简洞到双窑的这一块,阿弥陀造像比较集中”。<sup>④</sup>在南京栖霞山石窟中,最突出的是南朝时所造“无量寿佛,坐身三丈一尺五寸,通座四丈,并二菩萨,倚高三丈二尺”。<sup>⑤</sup>在自五代至元的杭州飞来峰诸窟里,虽然各朝都杂塑着弥勒和阿弥陀的像,但在较后的元代造像中,阿弥陀像占有绝对多数(第89、99、77、94、29、64、81、59、98、57、58、60、74、97窟),而弥勒(第42窟)和布袋弥勒(45窟)只有各一尊。<sup>⑥</sup>

## 二

除上文提及的云冈、龙门等石窟外,以下将敦煌、麦积山、大足和青州地区石窟的有关图像内容亦作一摘录,来补充和帮助说明一些问题。

从弥勒、阿弥陀等净土信仰之图像东传的角度看,敦煌莫高窟是进入中土的最重要一站,而且与新疆的现存石窟相比,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塑无疑是保存最好的。据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录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绘有《弥勒经变》壁画的,共有87个洞窟。按时代分,隋代有5个窟,唐代有61个窟(其中初唐有6个窟,盛唐有14个窟,中唐有24个窟,晚唐有17个窟),五代有11个窟,宋代有10个窟。莫高窟内有着《阿弥陀经变》壁画的洞窟63个,其中隋代的1个,唐代的39个(初唐的13个,盛唐的7个,中唐的7个,晚唐的12个),五代的9个,宋代的2个,西夏的12个。西夏的应该看作稍后于宋,特别是对在敦煌修窟而言。

当然实际情况要更复杂些,如绘有《观无量寿经变》内容的壁画也是与阿弥陀佛相关的,一共有84个洞窟有着这样的壁画。时间上也是以唐代居大多数,其中初唐的1个,盛唐的21个,中唐的34个,晚唐的18个,还有五代的4个,宋代的6个。另有41个洞窟绘着《净土变》内容的画,标明是“西方净土”的,当属于阿弥陀净土,不过这些画大部分是宋画和西夏画,时间上显得较晚,而在其它主题的壁画中也间或有弥勒或阿弥陀的形象出现。<sup>⑦</sup>从上述莫高窟壁画的弥勒和阿弥陀信仰的相关内容中还可以看到,有着净土信仰内容的洞窟在敦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无论是那一种净土

① 宫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第三部第二章,第398页。

② 王惠民《炳灵寺建弘纪年应为建弘五年》,载《敦煌研究》1998年第三期。

③ 李玉昆《龙门碑刻研究》之附表三、四,载《中原文物》1985年特刊号。当然“有纪年”是一种局限。如宫大中先生认为武则天当政时,“龙门的弥勒造像。出现空前的盛况”,见其《龙门石窟艺术试探》,载《文物》1980年第一期。颜娟英女士在其《武则天与长安七宝台石雕佛像》(载《艺术学》第一期,1987)一文中通过对此台遗存的32件石刻佛像分类,其中阿弥陀佛三尊像四件,弥勒佛三尊像七件,支持了宫氏的观点。而陈玉女先生“以清陆蔚庭稿本《龙门造像目录》为分析依据”,认为在历代佛教造像中,弥勒像与弥陀像之比为558:111(其中唐代为507:80),见其《龙门石窟佛教信仰圈之探讨》(载《2004年龙门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与别的统计差别很大,以资参考。

④ 李淞《龙门石窟唐代阿弥陀造像考察笔记》,载《艺术学》1997年第17期。

⑤ 江总《摄山栖霞寺碑》,载严可均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隋文》卷11。

⑥ 高念华《飞来峰造像》,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阿弥陀造像中包括以“西方三圣”和“无量寿佛”名义出现的。

⑦ 参见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少数壁画的时代划分和图像内容有的学者与《总录》意见不同,但基本上不会对统计数字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有质的变化。其它《总录》的情况亦与此同。

信仰,其高峰是在唐代,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中、晚唐。<sup>①</sup>此可以佐证“有唐一代,净土之教深入民间,且染及士大夫阶层”。<sup>②</sup>显然自隋唐起敦煌壁画中阿弥陀净土信仰要超过弥勒信仰。不过自大足以后,几乎没有大石窟的开凿,佛教图像后来基本上都是土质、木质、绢质或纸质,广泛散布于寺庙及家庭中,因此不能统计和轻易下结论。

天水麦积山是佛教进入长安之前所开凿的另一个重要石窟。这里据1953年中央文化部“麦积山勘察团”所作《麦积山石窟内容总录》对有关净土图像内容作一摘录:<sup>③</sup>

第005号(隋?)窟第3龕:龕外上壁有“净土变相”;

第011号北周窟:右壁四菩萨之二题记标明为弥勒菩萨;

第127号北魏晚期窟:右壁画有“净土变”;

第133号北魏晚期窟:甬道左壁“崇祯元年”题记中有“面礼弥勒在空中”之句;

由于窟内佛像残破和勘察团专家的谨慎,对造像作出身份判别的极少,如第013号摩崖大像,宫治昭先生认为是弥勒佛像,但《总录》没有说明。不过这并不妨害它原本“疏山凿洞,郁为净土”,<sup>④</sup>且据此已经可知这里也是二种净土信仰混杂和至明代还有弥勒崇拜。

随着大批被埋的青州石佛像出土,由于石质佛像往往与石窟关系密切,青州地区的佛教石窟也引起了重视。温玉成先生对这些石窟进行了调查研究,这里主要根据他的调查将有关图像作一述录。其中云门山石窟“1号窟开凿于隋开皇元年至十年间(581-590),主尊应是无量寿佛”3-5号窟凿于唐前期,“均为长方形中等洞窟,内造倚坐弥勒佛”。驼山石窟1号窟中据题记有“弥陀像一铺”2号窟有“隋开皇初年所造无量寿佛”3号窟内有“魏王李泰造阿弥陀像等”4号窟造于初唐贞观年间“造像布局为一倚坐无首弥勒佛”。<sup>⑤</sup>青州的这些有关净土信仰图像表明,至少在隋及唐前期当地弥勒与阿弥陀图像的开凿是交错的,难有先后之分。

### 三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也将主要是在宋代开凿的大足石窟的弥勒及阿弥陀图像情况作一对比:<sup>⑥</sup>

北山19号窟:龕中主像为阿弥陀佛,五代;

北山35号窟:主像为阿弥陀佛,五代;

北山40号窟:主像为阿弥陀佛,五代;

北山48号窟:西方三圣像,中座为阿弥陀佛,五代;

北山51号窟:三世佛像,右座为弥勒佛像,晚唐;

北山52号窟:主像为阿弥陀佛,晚唐;

北山53号窟:主像为阿弥陀佛,五代;

北山57号窟:主像为阿弥陀佛,五代;

北山61号窟:三世佛像,右座当为弥勒佛像,五代;

北山176号窟:弥勒下生经变相图,主像为弥勒佛,宋;

北山206号窟:三世佛像,右座当为弥勒佛像,五代;

① 应该指出,这些记录中的弥勒和阿弥陀图像是出现在经变画中,而以经变为内容的壁画要比佛教雕像出现得晚。敦煌的图像是以壁画为主,所以弥勒与阿弥陀图像集中在唐代,这恐怕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②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3页。

③ 载天水麦积山文物保管所《麦积山石窟资料汇编》初集,1980年编印本。

④ 庾信《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龕铭》,载《庾子山集》卷12,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72页。

⑤ 温玉成《青州佛教造像考察记》,载《中国佛教与考古》,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

⑥ 所录均据《大足石刻内容总录》,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北山 230 号窟: 西方三圣像, 中座为阿弥陀佛, 五代;  
北山 245 号窟: 观无量寿经变相, 主像为阿弥陀佛, 晚唐;  
北山 254 号窟: 三世佛像, 右座当为弥勒佛像, 五代;  
北山 268 号窟: 三世佛像, 右座当为弥勒佛像, 五代;  
北山 281 号窟: 小佛中有弥勒佛像, 也有阿弥陀佛像, 五代、宋;

北塔 5 号窟: 弥勒佛像, 南宋;

北塔 28 号窟: 阿弥陀佛像, 南宋;

北塔 39 号窟: 西方三圣像, 窟正壁为阿弥陀佛, 南宋;

北塔 57 号窟: 窟正壁为阿弥陀佛, 南宋;

佛耳岩 3 号窟: 三世佛龕, 右座当为弥勒佛像, 宋;

佛耳岩 6 号窟: 三世佛龕, 右座当为弥勒佛像, 五代;

佛耳岩 14 号窟: 三世佛龕, 右座当为弥勒佛像, 宋;

佛耳岩 25 号窟: 三世佛龕, 左座弥勒佛像, 宋;

大佛湾 18 号窟: 观无量寿经变相, 主像为阿弥陀佛, 在窟中“九品三生图”中各图都刻有阿弥陀佛像, 宋;

大佛湾 19 号窟: 上层主像为弥勒化身, 宋;

大佛湾 21 号窟: 柳本尊道场, 上层有阿弥陀佛像, 宋;

大佛湾 29 号窟: 三身佛, 西北壁有弥勒佛像, 宋;

小佛湾 9 号窟: 左壁上为阿弥陀佛像, 宋;

倒塔坡第一级正面: 有弥勒菩萨, 宋;

对面佛窟: 龕内为阿弥陀佛, 宋;

佛祖寺窟: 为弥勒佛, 清;

千佛崖 2 号窟: 西方三圣像, 中为阿弥陀佛, 明;

千佛崖 7 号窟: 观无量寿经变相, 中座像为阿弥陀佛, 明;

千佛崖 9 号窟: 观无量寿经变相, 中座像为阿弥陀佛, 明;

石门山 5 号窟: 龕内为阿弥陀佛, 清;

石门山 6 号窟: 西方三圣像, 正面为阿弥陀佛像, 宋;

妙高山 1 号窟: 主像为阿弥陀佛, 约为宋;

妙高山 4 号窟: 西方三圣像, 居中为阿弥陀佛像, 宋;

佛安桥 7 号窟: 三世佛龕, 右座当为弥勒佛像, 宋;

由于有不少雕像已经风化, 无从判别, 所以上述有关弥勒和阿弥陀的图像记录可能不尽准确, 但据此已经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其一是大足石窟虽然主要内容是密教图像, 但弥勒与阿弥陀的图像也为数不少。二者图像交错杂陈, 正说明了“净土宗和汉传密教在佛理上有着广泛的基础”。<sup>①</sup> 其二, 从大足的有关净土信仰的图像情况看, 供奉阿弥陀佛像的有 24 个洞窟, 供奉弥勒佛的有 16 个洞窟, 前者比后者多出 50%。这和敦煌的情况有些相似, 说明在中国西方净土的信仰者更多一些, 尤其在唐以后。这和上述敦煌壁画中联系起来看, 或许是由于“北魏至隋末, 多次农民起义与性质不明的暴动与弥勒信仰有密切关系”, 并成为“北魏至唐弥勒信仰的盛衰”和“阿弥陀西方净土彻底排挤了弥勒净土”之关键,<sup>②</sup> 因为对未来的期盼实质上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否定。但实际上主要原因恐怕不在于此, 而是因为西方净土所提倡的念佛能免罪积善之说明白简捷, 不需任何经济费

① 严耀中《汉传密教》, 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30 页。

② 唐长孺《北朝的弥勒信仰及其衰落》, 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98、206 页。

用,所以更容易被广大信徒所采纳。<sup>①</sup>但在广元千佛崖唐代开凿的石窟中,被称为弥勒窟的要多于阿弥陀佛为主像的窟,<sup>②</sup>足见情况之复杂,而且明清以降寺庙中几乎必有的大肚弥勒之造像,还真不好说弥勒信仰自南北朝以后已经被阿弥陀信仰所“彻底排挤”。

#### 四

净土信仰的图像表达当然不止在石窟之中,如《宋高僧传》卷21《唐明州奉化县契此传》云其:

“号为长汀子布袋师也。曾於雪中卧,而身上无雪,人以此奇之。有偈云‘弥勒真弥勒,时人皆不识’等句。人言慈氏垂迹也。……后有他州见此公,亦荷布袋行。江浙之间多图画其像焉”。

这里的“图画其像”应该主要是指绘制在绢质和纸质上的,以便于画师笔墨和家中供奉,那就不可胜计了。且鉴于以布袋和尚为范本的大肚弥勒造像在宋以后遍布于各地寺庙,足以说明信仰发展对图像演进之反作用。但这些已超出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

“正像东设,被在机缘”,<sup>③</sup>包括净土信仰在内的佛教图像之兴盛是有原因的。首先,图像的宗教作用是在于它能显示教主释迦牟尼和其它诸尊的威严,并直观地形象表达佛法的神通。图像也是把“佛、法、僧”三宝凝聚起来的一个集中点,而流行的所谓“开光”则是一个将佛或菩萨的“神”与泥塑木雕之形相结合的必不可少之宗教过程。因为由此“拟状灵范,启殊津之心;仪形神模,辟百虑之会”,<sup>④</sup>并围绕对佛像的供奉可以有利于建立起相应的祭祀与崇拜仪式,这对一个宗教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对以“愿”为信仰基础的弥勒和阿弥陀等净土信仰来说,偶像之前是作为表达“愿”的最合适场所,所以对其崇拜显得尤为要紧。

其次,佛教也是通过“像”来象征它的一些概念,如我们一般见到的“三世佛”或“十方佛”,及“千佛”等。又如“中亚、中国的弥勒菩萨是作为‘天上世界之主’,作为王者的形象表现”。<sup>⑤</sup>同时,佛教是以“像”来表示“相”的,虽然其中只有一些象征性而已,但三世表示时间,十方表示空间,使信众有佛界随处随时可求之感。且对争取民众信仰的宗教而言,信徒亲眼所见的形象和亲耳所闻的梵呗笼罩着他的整个感觉世界时,会对其心灵产生莫大的震撼,“见佛神悟,即得道矣”,<sup>⑥</sup>因此偶像的直观感染力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诸石窟寺所塑佛或菩萨像,由于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而本土化,更能打动中国信众的心灵。如“彩绘的蝌蚪式须,是印度任何地区艺术中所未见,而为西域敦煌独创的样式,如交脚弥勒菩萨在印度绝对找不到类例的,无疑也是我国独创的形式,最早见于敦煌系彩霞中,并在整个北朝时代里流行着。这些样式的东传到中原,首先都被麦积山本类型所接受了”,此外中土石窟造像中“例如发髻的光平,不作波浪式或螺纹刻划,肉髻的过高过前,耳垂的不穿孔,白毫之作宝珠型之类”等等,都是“大胆地把本民族的形象来代替印度佛教人物的形象,使作品具有亲切和纯化的民族特色”。<sup>⑦</sup>

再次,“偶像作为一种象征手段,它指向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sup>⑧</sup>在弥勒的图像中,它是作为“未来佛”的身份出现的。一如“诸神是有所暗示的神性(Gottheit)使者”,<sup>⑨</sup>在中国的弥勒形象表达

① 李静杰认为这种图像变化发生在“北朝晚期至隋早期”,尤以“邺都及周围地区”为著,原因则是“反映了法华经思想对佛教图像支配力迅速减弱,净土信仰对佛教图像影响力日益加强的情形”。见其《图像与思想——论北朝及隋的佛教美术》,载《清华历史讲堂续编》,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48、149页。

② 参见胡文和《广元千佛崖石窟艺术考察研究》,载《2004年龙门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③ 《续高僧传》卷21《习禅篇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合集印本。

④ 慧远《晋襄阳丈六金像赞序》,载《广弘明集》卷15。

⑤ 宫治昭《吐峪沟石窟壁画与禅观》附录,中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

⑥ 支道林《阿弥陀佛像赞并序》,载《广弘明集》卷15。

⑦ 史岩《麦积山石窟北朝雕塑的两大风格体系及其流布情况》,载《麦积山石窟资料汇编》初集,1980年编印本。

⑧ 罗伯特·C·蒙克等《宗教意义探索》第二部第五章,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页。

⑨ 海德格尔《筑·居·思》,载《演讲与论文集》,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7页。

中,又是从乐山这样的“大佛”到布袋和尚化身的“大肚”形象,暗喻着“未来”与“大”的关联。这很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当然也有利于信念的建立,助推着“过去和未来诸佛之说使历史的佛陀的觉悟普遍化了”。<sup>①</sup>如果作更多演绎的话,做功德作为净土信仰的一种表现,那么石窟开凿的本身也意味着对再生于净土的追求之功德积累。这恐怕也是石窟中有那么多与净土信仰有关的造像之原因。

最后,从诸石窟中弥勒造像与阿弥陀造像的交错分布情况来看,说明不同净土信仰之间的图像区分主要在教理上和教派上有意义,<sup>②</sup>而对于唐宋以降的一般信众来说“它们都是相对于‘难行道’的‘易行道’相对于‘圣道门’的‘净土门’相对于‘自力’的‘他力’这是完全一致的”,<sup>③</sup>或者仅仅在于做功德与念佛之间的差别。<sup>④</sup>这也反映着“至中唐时代,经典之研究及有关净土论议,几乎绝其踪迹,专规定实践修行之仪则,证明已正式进入实行期”。<sup>⑤</sup>又因为“弥陀佛为西方世界,不论在义学或禅观上皆代表着十方世界;弥勒佛为将来佛,不论在义学或禅观上皆代表着三世法界”,二者结合更能体现净土世界的全面与完整,如武则天时代遗存的七宝台佛像,赖鹏举先生据此认为,是“在主尊佛的侧面或两侧壁造出弥陀佛与弥勒佛”,形成所谓“十方三世的完整内涵”,<sup>⑥</sup>体现着净土信仰的一种合流。几乎所有保留稍微完整的石窟中,都并存着弥勒佛和阿弥陀佛的造像,只是数目比例上有或多或少之分而已。这是因为唐宋之间,佛教在教外与儒、道二家的“三教合一”之势越来越强,<sup>⑦</sup>教内诸宗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模糊。处于这种趋势之下,在“以大慈大悲消除一切差异”的净土信仰旗帜下,<sup>⑧</sup>不同倾向之间实现珠联璧合,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上述净土图像之种种而正是这种以图像供奉及做功德或念佛来作为简单的信仰表达,使净土信仰为佛教赢得最广泛的中国信众。

(责任编辑:张晓东)

① 肯尼斯·K·田中《中国净土思想的黎明——净影慧远的“观经义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② 或者是以某一教义来圆融。如杨明芬认为“西方净土与弥勒净土造像在石窟中呈现对应方式,是华严法界含摄十方三世的义学内涵之展现,也唯有在华严思想下两种经变的对应才相当有意义”。见其《唐代西方净土礼忏法研究》第六章,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页。

③ 松本文三郎《弥勒净土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④ 甚至这个差别可能也很模糊。如《太平广记》卷111“孙敬德”条引《冥祥记》云“自晋、宋、梁、陈、隋、唐、赵国,观音、地藏、弥勒、弥陀,称名念诵得救者,不可胜记”。不管此条是否出于《冥祥记》有伪,至少北宋之前念佛得救之信念成了净土信仰乃至佛教信仰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当是不争的事实。

⑤ 望月信亨《中国净土教理史》,慧日讲堂1974年版,第215页。

⑥ 赖鹏举《敦煌石窟造像思想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176、156页。

⑦ 参见严耀中《试说“三教合一”的不同层面》,载《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⑧ Kala Acharya, A Glossary of Buddhist Terms, Somaiya Publications Pvt. Ltd., Mumbai, 2002, p. 36.

**Abstract**

**From Teeth Tax to Sales Tax of Tianjin in Republic of China – in Case of Oil**

**SONG Mei-yun and WANG Jing**

Imposed the oil teeth tax from Qing dynasty in Tianjin. The merchants – tender replaced broker in 1925. But in this course , the fight for tax happened continually because the merchants increased tax rate arbitrarily , and the government overlooked the harm in order to gain finance income.

**“Take Care of Our Own Children”—Missionaries and Establishment of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 ( 1896 – 1912)**

**HE Fang-yu**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 ( SAS) , the first American school in east and midChina , was set up on September 17 , 1912. The establishment of SAS , which is considered to be an important symbol of Sino – American friendship , witnesses the efforts of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for years. In 1980 , the school was recovered and has now developed into the largest international school in China. Study on relevant issues of SAS will help make up for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education for children of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the meantime , we can know something about the social history of Shanghai and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Factory – Residence Mixed Block in French Concession**

**Lu Ye**

The French Concession in Shanghai was famous for its living environment at home and abroad. However , there was in its south an area that was not suitable for living. It was resulted from the plan and management of the different departments of French Concession. This paper makes an initial research into this phenomena and its influence.

**Image Resolution of Maitreyanatha and Amita Distribution in Huatu Grottoes**

**YAN Yao-zhong**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time and space distribution of the images of Pure Land beliefs and explains that the worships of Maitreyanatha and Amita in the Pure Land reliefs of China were mingled , especially since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ith the integration and folk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 there was no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 which was good for the wide spread of Pure Land beliefs. This paper also states the usage of image resolution in religious researches.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Eastern Palace Education Officials System in the Southern Dynasty**

**LIU Ya-jun**

The Eastern Palace Education official system was changed in Southern Dynasty. The education officials were glory while domestic chore officials had become lower than before during Song Dynasty.